

打破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藩篱

——专家研讨蔡骏作品《春夜》《一千万人的密室》



蔡骏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蔡骏代表作《一千万人的密室》《春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并讲话,张亚丽、何向阳、梁鸿鹰、贺绍俊、付秀莹、岳雯、杨庆祥、徐晨亮、刘大先、宋嵩、冯治辰、刘艳、郭汉睿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主持。

作家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作家、编剧蔡骏的长篇小说《春夜》,于2023年3月推出其新作《一千万人的密室》。在《春夜》中,蔡骏进行了优秀的上海想象与现实书写,直面生活又不失人性的温暖和光辉。《一千万人的密室》表现出了蔡骏对当下现实所拥有的强烈感触,用他细密的心思,让小说得以开拓和延展,使读者身临其境。大家表示,《春夜》和《一千万人的密室》都是不同凡响的突破性作品。

“本格”“硬汉”“社会派”的融会贯通之作

邓凯表示,蔡骏的写作见证了中国悬疑小说的发展。他的写作有着深刻的人文情怀和现实关照,在海外图书市场也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类型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蔡骏不仅深耕类型文学创作,在纯文学上也有探索,《春夜》和《一千万人的密室》是他近两年代表性的作品,融合了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其“心理悬疑”的写法具有醒目的个人辨识度。

张亚丽谈到,这两部作品是蔡骏自我突破的代表作,也是转型之作。《春夜》自成一格,以悬疑来关注社会家庭变迁和普通人的顽强;《一千万人的密室》可以被称作悬疑推理现实主义长篇,是“类型”“纯文学”“现实主义”被分别打碎之后的再度融合与组装,是“本格”“硬汉”“社会派”三大悬疑流派的融会贯通之作,结构严密,引人入胜,极具震撼力。

何向阳谈到,《一千万人的密室》在充满紧张感的外皮下,隐藏着对人性的关心。小说在艺术结构上致敬《雷雨》,暗合对照、极尽才华,深入展开对复杂人性的描写。故事里的红姐完全可以

看成是《雷雨》中的繁漪,带有一点神经质,也是受到伤害的一方。无论是节奏感、语言还是对人物的刻画,小说与《雷雨》都有着高度的互文性。

梁鸿鹰认为蔡骏的写作具有深刻的人文价值,两部作品都体现了很好的文化积累。其中《春夜》延续了中国的人文传统和民族记忆,力图概括社会面貌并填补精神空缺,在冷静中将诙谐、求真和求深结合在一起,是一部不可多得优秀作品。

贺绍俊表示,蔡骏的悬疑小说非常有特点,他将时代气息和现代精神带到了悬疑小说里。蔡骏是非常有创新意识的“全能型”作家,他把自身经历融入《春夜》中,成功塑造了工人群体的形象,展现了工人群体的情义和胸怀。同时他表示,《一千万人的密室》的叙述语言和腔调较为突出,作者似乎是在有意识地向日方现代小说语言学习,希望蔡骏在语言变化上的尝试可以继续下去。

“《一千万人的密室》是一部强大的长篇小说,蔡骏用他出色的驾驭能力创造了丰富的细节,能够治愈读者的心灵。”付秀莹谈到,作为同行,她认为蔡骏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优秀作家。蔡骏的作品有着独特的气味、气质和气象,其中的精神内涵不同凡响,体现出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怀。“读者读后会感觉到个体的病痛是如此渺小,命运是如此无常多变,人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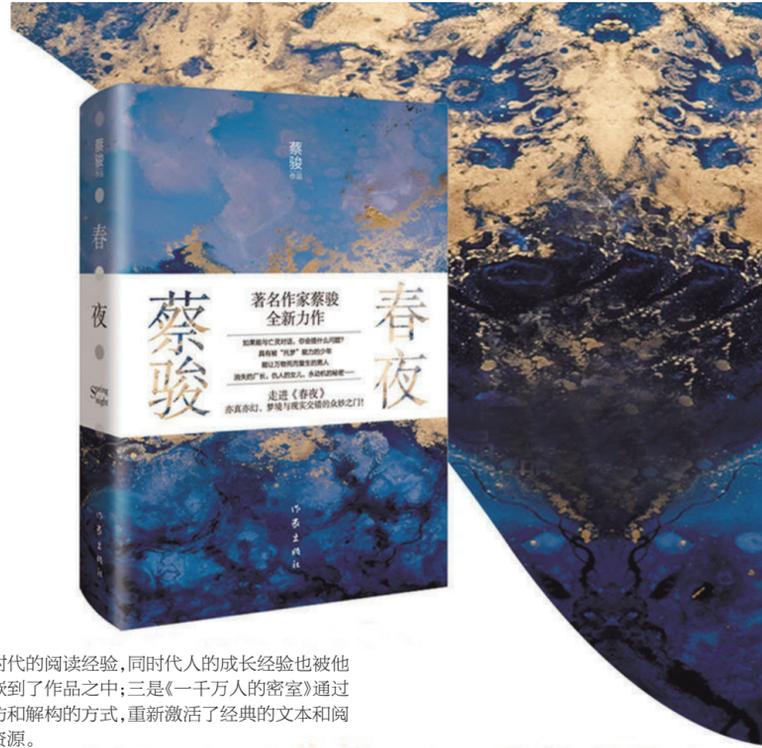
世界的关系如此复杂微妙,会更深入地思考一些人生问题。”

岳雯表示,《一千万人的密室》向读者提供了迷宫一般的“智力快感”。寻找凶手的过程中隐藏着层层翻转的圆形结构,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反复”所带来的美感,在阅读和探索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丑恶的人性和温暖的爱。小说中充满层叠叠嶂式的比喻,这些比喻不是为了追求文字的漂亮,而是一种断裂,意在提供一种奇异感,就像山峰一样,有前峰、后峰和“飞来峰”。

徐晨亮认为蔡骏在创作《最漫长的那一夜》时就已经开始转型,《一千万人的密室》和一些文学经典构成了一种互文,绵延十余年的案情全貌在叙事中就像套娃一样层层剥开,情节反转给人带来强烈的眩晕感。雪贝设计的谜局是以自我陷入的方式来保护他人,这体现了人性深渊中不可直视的恶的力量。“蔡骏让我们在小说所营造的极为复杂的气味当中接触他具有魅力的语言,这种语言又激发出我们的全部感官,这种设计非常有意思。”

真实与虚幻并生的众妙之门

“蔡骏的作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能给人带来享受的幻觉、快感和安慰。”杨庆祥表示,蔡骏的《春夜》《谎言之子》和《一千万人的密室》可以称得上是“社会派三部曲”,他的作品至少有三个层面的互文性,一是将社会层面的描写内嵌到推理之中,社会描写和推理本身并不是两张皮;二是对时代感和历史感的把握,蔡骏提供了大量



同时代的阅读经验,同时代人的成长经验也被他内嵌到了作品之中;三是《一千万人的密室》通过戏仿和解构的方式,重新激活了经典的文本和阅读资源。

刘大先谈到,《春夜》融合了推理、悬疑、青春文学,也掺杂了上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蔡骏把不同的类型和风格整合起来,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化语言将各种各样的典故融合到一起。“我在阅读时会联想到‘歇斯底里现实主义’,我觉得蔡骏是在‘歇斯底里’地使用典故,‘歇斯底里’地展现出各种各样的信息和知识,这种做法具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

刘艳认为,《春夜》这部小说虚实虚实,悬疑与现实书写并重,蔡骏就像一名生活的摄影师,记录着近几十年里上海人日常生活的枝枝叶叶、喜乐哀苦。“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生活的细节化叙述,尽收他笔下。切肤之感的鲜活经验,无比强烈、直面现实的日常生活摹写,对生活本来面目淋漓尽致的揭示,毫无遮掩扑面而来,让你躲闪不得,但现实表象之下又涌动着人性繁复曲折的复杂面向,并且不失温暖和辉煌。再日常不过的生活细节被小说家信手拈来,与虚幻的梦境杂糅,形成真实与虚幻并生的众妙之门,也体现了作者意欲书写一段上海历史尤其当代史的热望。”

冯治辰表示,《一千万人的密室》在语言上的特色主要体现在比喻的运用上。作者通过其独特的语言,生动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及其具体动作,这种创作具有值得思考的重要意义。

王国平谈到,悬疑并不是悬浮,蔡骏的文本内核里更多的是一种非虚构性,是小说文本与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有许多现实的知识 and 事件内嵌其中,包括一些时政类、生活类的内容,故事和事件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别驳杂的文本,但这个文本又被作者整合得精心而自然。小说中的人物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象,具有很强的突破性。

宋嵩谈到,蔡骏的作品是“本格”“社会派”和“硬汉派”小说的混合体,也是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之间的隔膜,是一部优秀的上海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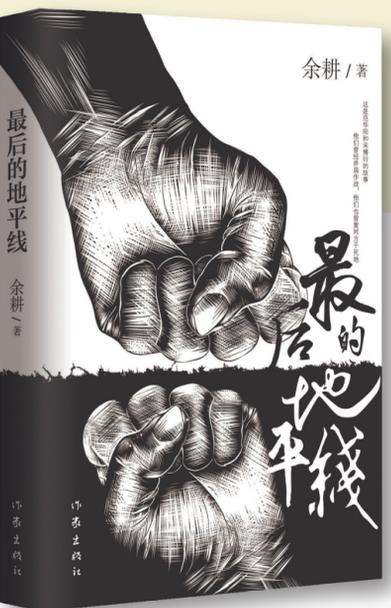
“蔡骏是一位非常勤奋、有才华、有创作激情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多变,尤其是近十年,他不断寻求突破,挑战尝试不同的写作风格,并对被社会变迁和时代洪流所裹挟的个人命运给予了更多深入观照和思考。”郭汉睿说,蔡骏是一个获得过巨大市场成功的作家,在创作转型作品时,需要抛弃掉熟悉的写作路径,这就需要他有一定的勇气,需要他具备足够的能量。

作者蔡骏在现场对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感谢。他谈到,要打破“路径依赖”,对于类型作家其实有一定难度,自己今后会继续努力,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既记录历史,也书写时代。

那些地平线上的勇敢身影

——小说《最后的地平线》创作谈

□余耕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运动员、记者和警察是我执业最久的。自我从事写作以来,这三个职业却从未出现在我的作品里。都说写作者会从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入手,但我却是个例外。迟迟没有让这三个职业进入我的写作,我想大概是因为热爱和敬畏的缘故吧。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淄博矿务局公安处刑警队侦察员。那一年进入刑警队只有两个人,我和另外一名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据说是局长特别关照过,让两个主力球员进入刑警队。直到此刻,我还记得第一次穿上警服的兴奋心情,恨不得连睡觉的时候都穿着。

从小习惯了篮球队的集体生活,也养成了自由懒散的生活习性。我记得那个时候早晨八点半上班,同事们大都八点就到办公室了,墩地、打水、整理内务。我却总是赖床,要九点钟才能到办公室。天长日久,大家习惯了品性,直接把我归到“不务正业”的分类里。半年之后,跟我一起分到刑警队的队友配枪了,甚至比我晚来的队员也配枪了,我却却没有配枪。我以为是我的“不务正业”影响配枪,但是刑警队长却私下告诉我,是因为人家早早交了入党申请书,而我却没有积极向组织靠拢的思想觉悟。接下来我在刑警队待了五年,也是刑警队唯一没有配枪的侦察员。虽然没有枪,但我就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嘎子一样,逮着谁就摸谁的枪。只要是进山里面办案,我就会怂恿大家去练练枪,然后打光大家的所有子弹。

那个年代盗窃案比较多,小到自行车、摩托车,大到保险柜乃至入室抢劫。案发后,如果现

候,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

接下来,我继续着我破罐子破摔的职业素养,上班时间越发延后至中午十一点左右,到了单位直接去食堂吃午饭。我的同事们则越发努力地工作,因为单位正面临改制,我们企业公安将改制并轨到地方公安。有一天中午,我刚刚到单位,习惯性推开侦察科王科长的门,因为我们俩几乎每天中午都会结伴去食堂。王科长是一个很高很帅的老头,无论穿西装还是穿警服都有派,他学识渊博、智商在线且性格开朗。那天我推门喊王科长去吃饭的时候,却发现他趴在桌子上头也不抬地冲着我摆手,意思是让我自己去吃饭。我以为王科长病了,上前去扶他的时候才看到他在哭。我当时有点懵,到了食堂后才知道,领导上午找王科长谈话了,因为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

那顿午饭吃得我食不知味,我当时在想,像我这种没有背景又吊儿郎当的人,即便是一辈子干到一个科长,临退休的时候还要如此不舍……吃完那顿饭后,我便做了一个重要决定:辞职!递交的辞职报告,仅用了一周时间便得到批准,我想领导们大概是巴不得我早点辞职。躺在单身宿舍里,无所事事的我开始每天睡到中午。睡了两天后,第三天凌晨,我被楼下的吵闹声惊醒了,恍惚中我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什么尸体被烧焦了……

出于职业敏感,我即刻穿上衣服下了楼。单身宿舍跟医院一路之隔,路的尽头拐弯是医院的太平间,晚上很少有人走这条路。在这条僻静的路上停放着一辆被烧毁的桑塔纳轿车,轿车里果

然有一具烧焦的尸体。我当即给刑警队打电话报警,并驱散围观群众保护好现场。不一会儿,刑警队的同事们赶到了,根据车牌号码很快查到车主,而这个车主居然曾是分局刑警队的人,数年前辞职经商了。我当时有点小兴奋,也有点小沮丧,兴奋的是我终于遇到一个大案子,沮丧的是我已经辞职了。

上午时分,市局刑警队的人也赶来了,我一个不可描述的身份在案情分析会上做了现场第一目击者汇报。接下来,领导们也没有拿我当外人,让我跟着专案组继续工作。案情倒也不复杂,两天时间便行告破,是一起婚外恋情杀,凶手也被顺利缉拿归案。这个很特别的案件,似乎是为我五年刑警工作画了一个句号。一周后,我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要好的同事们搞了一个欢送宴会。兴许是酒喝多了,我突然间抑制不住自己大哭起来,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女人一样哽咽。

许多年过去了,那个守着一帮大老爷们儿哭泣的场景经常浮现在脑海,我却始终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一刻突然失态。大概在三年前,以前的同事给我发来一张柳泉公安分局干警的合影照,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帅气的警服,我决定写一个警察的故事,也算是对我人生第一份职业的纪念。在写作《最后的地平线》时,二十多年前那些熟悉的场景又重现眼前,当年疏离的我恰好拥有了客观视角。而“地平线”也隐喻了警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一步天堂,一步地狱。如何在地平线之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警察,则需要付出经年累月的坚守与隐忍。

上个月我回过一次原先的单位,它现在已经改制为柳泉公安分局,曾经的两位同事已经被提拔成为副局长,老朋友见面分外亲热。曾经的刑警队队长从副局长位置上退居二线,还有一位老队友,因为工作过于操劳,去年发生脑梗……聊起当年的人和事,大家依旧像年轻时一样嬉笑怒骂大嗓门儿。我跟我的老同事们说,我写了一部关于警察的小说,马上就要出版了。同事们问我,有没有把他们写进去。我说有,每一个细节里都有你们的影子。

说心里话,我很佩服我这帮老同事,一份工作就就业业干了将近三十年,日常无非就是眼里那些鸡零狗碎的案件,可他们坚持下来了。望着他们沧桑的面容,我由衷自省我做不到,我当时之所以冲动辞职,就是因为我一眼能看到自己退休时的情景。我这些同事、队友也一样能够看到自己的未来,可他们有勇气走到底,我想他们才是生活中的强者。而我不是,我是这支队伍里的弱者,我是个逃兵。

那天晚上酒喝了不少,我的心情像二十多年前一样激动,几欲落泪。那一刻,自己突然想明白了王科长为什么会哭,我为什么会哭。警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被人们赋予想象中的光环,也常常遭受莫名的诟病,其中的悲苦辛酸怕是也只有做过警察的人才能体会。警服加身,会使很多人信赖,面对违法犯罪时,更会被普通人寄予期待。当我和王科长脱下警服的时候,那些与这份职业相关联的褒贬随之烟消云散,可警察毕竟是我们曾经憧憬过的职业。我想,我们的泪水应该是对警察这个身份的不舍。